



为了美国人的健康
—— 医务总监自述

〔美〕C. 埃弗雷特·库普 著

KOOP

The Memoirs of
America's Family Doctor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DE 986

为了美国人的健康

——医务总监自述

〔美〕C. 埃弗雷特·库普 著
贾宗谊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R199.712
J2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美国人的健康——医务总监自述/(美)C. 埃弗雷特·库普著;贾宗谊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ISBN 7-5001-0327-1

I. 为… I. ①库… ②贾… II. 医疗保健事业-评论-美国 N. R19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605 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100810 电话:6022134 电报挂号:623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怀柔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 印张 字数 280(千)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6022124

ISBN 7-5001-0327-1/G·66 定价:10.00 元

Copyright (c)1991 by

C. Everett Koop

Chinese language rights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美国兰登书屋 199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章婉凝

责任校对：徐元歌

献给我的妻子贝蒂
和我们的儿孙们

● 原书内容简介

当里根政府提名埃弗雷特·库普医学博士担任美国医务总监的时候，许多人曾对此予以嘲讽。《纽约时报》称他为“不合格的博士”，主要是因为他在堕胎问题上所持的反对态度已广为人知。差不多过了一年的时间，参议院才通过了对他的有很大争议的任命。

库普博士对保健问题采取了非意识形态的立场；他的公开言论令人耳目一新；他大力进行宣传活动，动员美国防治艾滋病祸害；他的所作所为使他的批评者和同盟者都感到迷惑。而八年以后在他辞职之时，大家都普遍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率、最直言不讳的医务总监。

现在，库普博士在其透露内情、畅叙衷肠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谈到他那堪称楷模的医务生涯，他在其行医的一生中“始终尊重人的身体”。他谈到他作为美国著名儿科医生所治愈的那些儿童，而儿科外科专业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拓发展起来的。他谈到他行医的实践、心灵的觉醒，以及他的子女的诞生，是如何使他形成关于堕胎和安乐死的观点的。他对他担任医务总监时期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谈到：他是不顾里根政府的意见，坚持认为艾滋病是影响所有美国人的一场危机的；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对性教育进行意想不到的、直言不讳的支持的；他是如何开展宣传活动，促使人们注意被动吸烟的危害和残疾儿童的权利的。

库普博士向读者谈了他对美国当前最迫切的保健问题的独特

看法和见解。他的著作充满了热情、幽默感和宝贵的知识。这是一部关于一个不屈不挠地坚持原则、诚实正直、充满同情心的人的著作，它既记录了作者杰出人生的光辉，又讲述了他千方百计地帮助全体美国人克服当代医务和社会方面的危机的故事。

关于作者

埃弗雷特·库普医学博士目前同他的妻子贝蒂居住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

● 鸣 谢

我的生活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使我受惠的个人、家庭和单位实在太多了，难以做到一一列举。

我常常想，有朝一日，我是要写写医生和小儿科医生这个行当的发展的。我不时把这方面的片断写下来或者口授给别人用打字机打下来，以便日后使用。我在儿童医院的一位秘书艾科·艾克达替我打字。虽然我已多次向她表示感谢，但我此刻仍要再次向她致谢。

在华盛顿工作期间，我始终坚持记笔记，不仅记下所发生的事件，而且还写下我内心的感受。我在儿童医院的另一位秘书劳拉·莱恩斯当时已经退休，她是为我做一部分打字工作的理想人选。她忠实可靠，值得信赖。

当我最后着手著书的时候，打字工作最初由维尼达·迪特里希担任，其后由南希·布雷肯里奇接手，最后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南希·里特曼。里特曼跟我配合得真好，当我的初稿完成时，她已经成为我的助理。从那时以后，她和另外两个出色的妇女照顾我的生活，以便我能完成写作任务。玛丽·李·盖根自我从医务总监的岗位上退休便帮助我工作。从那时以来，她以非凡的能力，协助我进行写作。第三位妇女是黛安·安德烈科维奇，她承担了日间的杂务，使我得以悉心著述。有许许多多新朋老友帮助我查找资料、核对日期和事实，他们是：费伊·阿卜杜拉、埃德·马丁、雪莉·邦纳姆、厄尔娜·戈尔丁、路易丝·施瑙弗、詹姆斯·马丁戴尔、罗恩·戴维斯、马特·迈尔斯、吉姆·布朗、休·达尔

曼、简·阿莫特、沙伦·史密斯、沃尔特·怀默和弗兰·芬恩。

我担任医务总监期间一直给我当特别助理的特德·克龙，对我理解和阐述某些问题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他所作的许多努力深印在他的记忆里。我的著作在许多方面都有他的一份贡献。

过去十年里，吉姆·迪克森一直是我的顾问和知己，他的贡献比他承认的要大得多。蒂姆·约翰逊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地从事写作的地方。他是我的第一读者、批评者。除了我的家人外，只有他读了我的全部手稿。他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

我的代理者欧文·拉斯特和我的出版者彼得·奥斯诺斯在我写作的初期给予了我必要的批评指正，而又鼓励我坚持完成这项工作。我感谢他们的专业知识、敏锐目光和正确指导。当我认识我的编辑贝特西·拉波波特时，我希望她将成为我时常在书上看到的那种编辑，即“她的难以置信的技巧和理解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她果然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不仅如此，她还成为我的朋友。约翰·惠特曼按严格的时限完成任务，经过他的手，质量不佳的照片也焕然一新。

我的家人干了许多琐事。他们精心周到的安排给我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我的女儿贝特西·汤普森把一宗宗事件逸事加以核对、编制目录，然后输入计算机，以便于查考，她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像往常一样，我的妻子贝蒂既是我的顾问和指导，又是我的读者、校对员和批评者，更是一位良师益友。

我的长子艾伦既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革新意见，又做了许多抄抄写写的艰苦的琐事，本书得以问世，他的功劳最大。没有他的操劳，本书即便可以出版，也会推迟许多年。自从我开始写这本书以来，他的重要性日益显出，因为其他许多活动，如电视台采访、巡回讲课和专业指导等，挤占了我那么多写书的时间。无论说多少次“谢谢”，也不足以表达我内心对他的铭感之情。

● 引 言

1980年8月寻常的一天，费城儿童医院我的办公室的筛查系统漏进来一个电话。

“你是否认为医务总监现在该由一位医生来担任？”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是否认为医务总监现在该由一位医生来担任呢？”

一下子，我竟无言以对。事实上，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即使对医务总监的事有所考虑，也考虑得不多。但打电话的人敦促我考虑一下在共和党新政府供职的可能性。离总统大选还有15周的时间。我绝不是当政治家的料子，但是，下意识地，我没有把话说死。我说我或许可以算作一个考虑对象。我把打电话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记在纸片上，塞在写字台上吸墨纸板的角下。他叫卡尔·安德森，是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的行政助理。

次日，遗产基金会打来电话。

“在我们的电脑储存库里找到了你的档案，你是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维护生命派*，在学术上颇有经验。你是否愿意当医务总监？”

第二个打电话人的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我当时也对他说，

* 维护生命派，原文为 pro-life。有的字典解释为“反对堕胎合法化”。译者认为其内涵更广，不仅反对堕胎，也反对杀婴和安乐死等，故译为“维护生命派”。——译注

是的，我可以作为一个考虑对象。于是，在吸墨纸板的角下又增加了一个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几天以后，第三个人打来电话。

“库普博士，我是约翰·康登。我们在比利·格雷厄姆家见过面，你当时给他讲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我现在给里根-布什物色人才。你愿意不愿意当医务总监？”

“你怎么能认为他们一定当选呢？”

“那你就别操心了！”

“你是第三个打电话询问这件事儿的人了。你们是一块儿工作的吧？你们知道彼此做的事情吗？……可以这样说，我可以作为一个考虑对象。”

此君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跟另外两个人的放到了一起。

我坐在我的椅子上向后伸了个懒腰，感到奇怪的是，三个电话先后打来，时间怎么会如此巧合。我的工作生涯即将进入最后一年。明年，我将满 65 岁。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惯例是，当你的那个魔术般的数字 65（岁）到来之际，你就得在这一年的 6 月底以前退休。

我自 1942 年以来就在医学院执教，在学术的阶梯上不断攀登，担任了两个教授职务。此外，作为儿科医生，我对临床的兴趣和资历，使我自 1948 年以来一直担任费城儿童医院外科主任之职，一个人连续任职时间之长，这在全国尚属首例。我的退休安排在明年 4 月份，除了告别宴会外，还有一项学术活动，世界各国的一些儿科同行们也将应邀参加。那时，接班人已坐进我的办公室，我将成为儿童医院的老前辈。

在以后几周中，关于邀我任医务总监职务的三个电话只是偶尔浮现在我的脑际。我的妻子贝蒂——单独同她在一起时，我通常称她为莉丝——也只是偶尔提及此事。这个前景对我似乎并不太现实。

1980年11月选举日，贝蒂和我下班后，同我们的儿子诺曼和儿媳安妮一起，从我们在费城郊区的寓所开车大约一个小时，到新泽西州迪尔菲尔德去看选举结果。我已经说过，我不是从政的材料。我唯一的一次参与政治活动，只不过是当了由70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而已。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性监督组织，旨在保证费城选举日的投票公正无欺，这可不是小事。我希望共和党在1980年获胜，因为我像大多数选民一样，对卡特当政期间，美国明显地未能发挥出潜力感到恼火。当我看到里根以压倒多数获胜时，我内心充满乐观情绪，这是以前在选举之夜从未有过的情绪。

在我们驱车回家的时候，一向判断力很强的贝蒂给我提出了一个忠告，结果改变了我的生活。像往常一样，她又为我充当了一次最重要的顾问。多年来，她的忠告屡次明智地指引了我们共同的航程。

“你要知道，明年退休后，如果你去干你给自己选择的那份儿差事，那你就可怜了。你想过没有：你当了30多年的头头以后，现在却只在医院看病呀、讲课呀，忙个不停，而掌权的则是别人，那是个什么滋味啊？许多人仍然会把你当作上司，他们会把新领导班子当权时出现的令人不满意的事情对你讲，而你却无权处理。你将是很可怜的。你为什么不与那些给你打电话的人谈谈当医务总监的事呢？”

我们沿着宾夕法尼亚的公路在黑暗中行驶，我知道她是对的。展望前程，我一点儿也不乐观。所以星期三的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写字台吸墨纸板下面找出那三张写着人名和电话号码的揉皱了的旧纸片。

真有点神奇，头两个人的电话一下子就接通了。而约翰·康登却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记得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的妻子居然也知道我是谁。我给他们讲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上次通话时，我

在谈到当医务总监时说，‘我可以作为一个考虑对象’。现在我要把那句话改为：‘我在热心谋求这个职务’。”

“医务总监”的职衔比这个职务本身更为有名。这个职务的设立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约翰·亚当斯当总统时，建立了公共卫生署；1870年的一项立法把这个机构置于一个医生的领导之下，他的职衔叫“医务督导”，后来这个职衔改名为“医务总监”。50年代初设立卫生教育福利部以后，医务总监的职务基本上消失了，只发挥过一个作用，那就是1964年发表了关于吸烟有害的报告这个里程碑，以及随后的关于在每包香烟的包装上和香烟广告上必须印上关于吸烟有害的警告性字样的规定。到1980年为止，医务总监的职务实际上名存实亡。尼克松当总统期间，这个职务一直空着，卡特当权时，它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的工作结合起来。里根的计划要求恢复这个职务，把它置于卫生部助理部长的领导之下。我不大了解里根班子的人是怎么想的，但事后看来，他们把医务总监的工作主要是当作促进其社会计划，特别是解决维护生命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手段。

当时，我很天真，没有认识到关于我的提名是一个政治性问题；支持我的人对我的医务背景并不太了解，只不过知道我在维护生命问题上的立场而已。对他们来说，那是我唯一的任职条件。他们对我的认识主要是依据下述事实：我搞了一项以“人类发生了什么事”为主题的活动计划，其中包括举办研讨会、观看电影和阅读书籍。这项计划是我同神学家弗朗西斯·谢弗一起提出的，旨在引起人们对堕胎、杀婴和安乐死等问题的重视。这些活动在保守的政界人士中广为传知。

我对医务总监的工作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职务是要发挥医务领导作用，特别是在教育公众促进保健和预防疾病方面。正是由于这个错误的理解，导致我同那些把我弄到华盛顿任职的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在我决定我愿意担任医务总监之后，我的情绪便处在时而乐观时而悲观的起伏不定的状态之中。我被列入医务总监几个候选人名单之后，便开始收到要求任命我的报纸社论和写给国会议员的信件的副本。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收到里根班子的正式文件，或者何时收到这样的文件。每天不断地有关于我中选的消息、传说和暗示，也同样有表明我落选的迹象和线索的报道。

当理查德·施韦克被任命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时（这是我与之共事的三人中的第一人），我认为这是个好迹象。我以前就认得施韦克，我认为任命他是再好不过了。在圣瓦伦丁节（2月14日情人节），施韦克对我说，里根总统已经任命我为卫生部助理部长，并答应提名我为医务总监，不久以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将改组。没有任何人直截了当地说过，我的被任命是因为我热心于从事维护生命的活动。我认为，施韦克也不完全了解这一点。

我很激动。但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我年纪太大了。一天晚上，施韦克打电话对我说，他刚刚获悉，现行立法规定：医务总监的年龄不得超过64岁零29天。我的年龄比这个规定大约超过了100天。但他安慰我说，根据法律，总统在这项任命上必须征求参议院的“意见，并得到它的同意”，参议院可能让国会修改这项法律。美国毕竟刚刚选举了70岁的里根作为它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肯定不会有人设想不许一个64岁的人担任医务总监。

于是，贝蒂和我清理了一下费城的事务，准备搬到华盛顿。不过，暂时我还得监管对最近大约30个病人的照顾工作，我对他们负有特别的责任。1981年3月8日，我们开车驶往华盛顿，这时我才认识到，我对我可能要担任的工作，了解得多么不够。我对贝蒂说：“如果我不得不去说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或者该说的不能说，不该说的又非得说不可，那咱们就回家。”

考虑到里根政府后来的做法，我没有被置于那种境地，这几

乎是个奇迹。在我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我就同施韦克坐在一起，对他说：“部长先生，我想你应当知道，我不想用我的任命作为一个讲坛来宣传维护生命派的主张。我认为，在堕胎、杀婴和安乐死问题上我应当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在这方面，我已经写了两部书，拍摄了五部电影，在国内外讲了许多。我还有什么更多的可以说呢？”

施韦克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他好言相劝：“老兄，低下你的头，闭上你的嘴吧。”

但是，不管我是否喜欢，堕胎问题是个关键性问题，因为越来越起劲儿的反对我的人，正同我那天上午对施韦克所说的话对着干。

里根时代开张伊始，数以百计的新人抵达美国的首都，贝蒂和我便是其中的两个。我们眼下的问题是找一个住处。第一周，我们住在离国会山不远的“优质旅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马丁·艾克尔伯格在国家儿童医院医疗中心当儿科大夫，他和他的妻子南希邀请贝蒂和我暂时跟他们住在一起，等我的任命被确认以后再说。我原以为他们只愿意让我们呆一周的时间，以后就不再欢迎了。不料我们在人家那里做客，一呆就是九个月。

1981年3月9日我上任的第一天，我的感觉比我小时候到一所新学校的第一天还要糟糕。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汉弗莱大楼第七层的一间房子去报到，那座大楼同国会山的林荫道隔着两个街区。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除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之外，空无一物。根据指点，我坐在那里，等待有人来。等了又等，闲着无聊，便擦拭电话。透过窗户，我看到国会大厦的圆形屋顶，上面的美国国旗迎风飘扬，周围的景色激动人心。当我凝视窗外时，一种使命感和目标感在我心头油然而生，自从我1946年初第一次踏入儿童医院开始我的儿科医生的生涯以来，还

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情。现在，我又要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涯了。我如何才能获得超过儿科医生工作带给我的那些成就和喜悦呢？

随着时光一分一秒流逝，我的期望和热情逐渐冷了下来。下午一两点钟，即将退休的卫生部助理部长查利·米勒带我去会晤我新的顶头上司埃德·布兰特，他最近被任命为卫生部助理部长。布兰特是俄克拉何马人，说话简明扼要，他显然关心自己的任命能否被批准。他只简单地对我说，我必须宣誓就职。他对我没有再作别的解释或指示。卫生部助理部长托姆·麦克菲（主管人事工作）尽了主人之谊。我回到我那间寂寞的办公室里乱糟糟的桌子旁，重新眺望国会大厦的圆屋顶和美国国旗，心里想着我在扮演新角色上能否有出息。我的孤独感开始增长了。

如果说我曾经相信过上帝的权威的话，那就是在华盛顿那间空房子里最初的那些孤独时刻。那时我深深感受到上帝和国家的力量，有一种巨大的使命感和机会。尽管第一天我有些疑虑，但我相信，地平线上的那些云雾是不大的。至于涉及我的年龄的那个技术性问题，我也相信人们说的话：那不足为虑。我已经看到报上的一些文章，提到某些主张堕胎的集团对我的任命表示不满。但我还没有意识到，当我等待国会批准对我的任命时，我会遭到他们和其他一些集团多么猛烈的反对。

我面临着同强敌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前景。每日每时碰到什么人，我都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这将像我在费城儿童医院当医生初期碰到的那种情况一样，当时有人说那里不需要我，说我没有用处，我必须对这些人表明我存在的价值。这将是单枪匹马的艰苦斗争，正像我在布鲁克林第124公立学校最初的那些日子一样。

● 目 录

引 言	9
第一部分 当医生	1
第一章 布鲁克林孩子	3
第二章 静静的北方，山风	28
第三章 从纽约到费城	50
第二部分 当外科医生	73
第四章 医务和信仰	75
第五章 外科和儿童	99
第三部分 当医务总监	131
第六章 批准	133
第七章 穿上军服	157
第四部分 大问题	169
第八章 吸烟	171
第九章 艾滋病	205
第十章 婴儿多伊和残疾儿童的权利	257
第十一章 堕胎	282